

# 藏書章與藏書票

王登泉



我國歷代文人學者多愛博覽羣書，藏書自然成了終身的嗜好。比較講究的人或書法收藏家們常常鐫刻金石、製章留印，即“某某藏書”“某某收藏”“某某珍藏”也有採用自己喜歡的閑章代替，往往蓋印於扉頁，加上篆刻家的精心製作的藏書章便不脛而走，逐漸流行起來。相傳在宋朝宣和年間除用於書畫碑帖以外已經通用於圖書專集，算是藏書章的先聲。宋、元之後，明清書畫家更是樂於此道。

買書藏書加蓋印章其目的是標明書籍所有，本來是藏書家個人愛好，却給後人留下一點追本溯源的線索。人們買回書笈之後，總愛在書的第一頁右下角鈐上一方朱紅的印記，替這本新書增添些色澤，以留作紀念之意。藏書章的大小以個人的喜好而定，一般在2—4厘米之間為宜。形狀多為正方形、長方形、圓形、橢圓形和不定形。現代藏書章的內容除篆有章主的姓名癖好之外，根據各人的需要加刻有人物、動物、圖案，給藏書章增添了新時代特點和裝飾趣味。

正同我國的藏書章一樣，西方藏書家另有一種標明收藏書笈的喜好，那就是藏書票。藏書票源於歐洲，這種藏書票大都有票主的姓名，或冠以HIS BOOK（意為我的書），國際上通用是EX·LIBRIS。根據世界上第一張藏書票的出現遠在一千四百八十年以前，是在一位名叫勃蘭登堡的藏書上發現的。書票的內容是畫一小天使手執盾牌，盾牌形狀似牛非牛。十五世紀以來，德、法、英、意、俄、美等國先後興起藏書票，以後遍及亞洲各國。唯有日本的藏書票發展甚快。日本在本世紀四十年代初期就創立了全國性的藏書票協會，並利用“書窗雜誌”逐期發表書票作品，出版《日本書票協會通訊》、《現代日本書票集》以促進書票藝術的交流發展。

藏書票上除刻有圖案之外，必須刻有藏書者的姓名，有時刻上藏書者的門第、身份和癖好。因藏書票是一種小型的版畫藝術，一般大小限制在3—10厘米之間，在藝術形式上採用木板、銅板、石版畫居多，其它如絲網版、紙版、剪紙等形式也常運用。藏書票的題材極為廣泛，人物、風景、花卉魚蟲、飛禽走獸、風雨雷電、山川草木、文房四寶，現代生活，歷史傳說等等都可成為書票的創作題材。在藝術風格上也是豐富多彩的，無論工筆、寫意、抽象、寫實、變形、浪漫手法亦可各具巧思，任其發揮。總之藏書票這種袖珍版畫是以小巧、精緻見長，盡可以把畫家的創作才華，興趣愛好與藝術修養充分地顯露出來。

綜上所述，藏書章乃是我國傳統的篆刻藝術，是我國古代文化藝術的一個組成部份。它們是以文字為主，在形式上與內容上有著鮮明的民族特色。而藏書票則是西方傳來的一種小型的袖珍版畫，它具有圖文並茂的特點，同樣可以反映出創作者的民族特色與藝術風格來。而這兩者都有相同的作用。它們都是藏書家的專用圖記，也是書笈藝術不可缺少的一部份，同時，還是書笈史學家研究藏書人和書史的物證。

藏書票作為一種版畫藝術，它較之藏書章在內容和形式上更豐富、美觀，更富有藝術品的欣賞價值，而讓羣眾所喜愛珍藏。版畫家們在創作藏書票時，能將以中國的藏書章巧妙地溶和在藏書票之中，讓高雅、別具風味的藏書章成為藏書票中不可缺少的部份，這同中國畫上的題款，用印一樣重要，既可增強繪畫的意味，也可增強形式的美觀，使之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藏書票。我認為這是中國藏書票發展的必然趨勢，當然，就目前來講我國的藏書票藝術還在發展之中，還得需要從實踐到理論的不斷探索。事實上任何藝術形式的發展都離不開民族形式這個源泉，也只有植根於我國生活的肥沃大地，才能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藏書票藝術形式來。



的“景外意”、“景外妙”，《宣和畫譜》記載他在“高堂素壁，放手作長松巨木，回溪斷崖，崖岫巉絕，峰巒秀起，雲烟變滅，掩靄之間千態萬狀”。和李成相比，有出藍之譽，當時的評論者推許他“獨步一時”，無人可及。從我們現在能見到的《早春圖》、《古木遙山圖》、《幽谷圖》、《山村圖》、《溪山秋霽圖卷》、《關山春雪圖》、《秋山行旅圖》、《窠石平遠圖》……等畫中看到，的確如文獻所談：“施為巧瞻，位置淵深”。鄧椿在《畫繼》中把他的作品列為“銘心絕品”，難怪沈存中這樣說過：“克明已往道寧逝，郭熙就得新來名”。王穉登在跋《溪山秋霽圖卷》上題到：“李成郭熙，並宋名手，一時畫院諸人爭效其法。”他的作品竟引起了大文

豪蘇軾的詩興，題詩曰：“玉堂臥對郭熙畫，發興已在青林間……江村烟外雨脚明，歸雁行邊餘疊嶂”。說明他作品是具有豐富、熱烈的情感的。

郭熙的主張在他身上是卓見成效的，對稍後的劉松年、李唐、馬遠、夏珪等人都有影響，直到明清的一些山水名家也大有他的遺風所在。他是李成、范寬、董源之後繼起的山水大師，起了輝映過去與開啓後來的偉大作用。當然，郭熙由於時代的局限，在他的畫論中還有一些剝削階級的功利主義成份。但他對待藝術創作的主張和態度，仍然有我們可以借鑒的地方。

1968年11月初稿 78年修改